

Crowning: The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of Journalism Award

媒介·中国
研究丛书

加冕

新闻评奖制度与实践

黄顺铭◎著

学出版社

加冕

新闻评奖制度与实践

Crowning: The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of Journalism Award

黄顺铭◎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加冕:新闻评奖制度与实践 / 黄顺铭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7.8
(“媒介·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5657-2090-1

I. ①加… II. ①黄… III. ①新闻—评奖—制度—对比研究—中国、美国
IV. ①G219.2 ②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8783 号

加冕:新闻评奖制度与实践

JIAMIAN: XINWEN PINGJIANG ZHIDU YU SHIJIAN

著 者 黄顺铭
责任编辑 李唯梁
责任印制 阳金洲
封面设计 王淑君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玺诚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7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57-2090-1/G·209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自序

1986年5月20日晚,家乡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雨,被称为“520大风”。大风吹倒我家大门的两扇门板,拦腰折断了修房时留在屋中的一棵碗口粗的柏树,也刮飞了饭桌旁我的荣誉墙上贴的一大堆“第一名”和“三好学生”之类的奖状。后来,在关于这场暴风雨的家庭记忆中,那些奖状也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它们不但发挥着证明当年那个初一学生如何优秀的作用,而且也发挥着让我那些侄子们向舅舅/叔叔好好学习的教育作用。

后来,作为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的我,尽管又陆续获得很多奖状和证书,然而那年一夜之间彻底消失的那些奖状却仍然依稀存留在我的记忆深处,甚至还会偶尔被激活。比如,2008年夏秋之际,当博士一年级的我最终决定以“新闻奖”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时,脑海中便立即浮现出了那一幅暴风雨刮飞了奖状的画面。这一次记忆激活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我从一个自传性的闪光灯记忆出发,开始关注新闻从业者与奖项的关系。两年多后,我完成博士论文,并顺利通过了答辩。

这本题为《加冕:新闻评奖制度与实践》的小书,是我的第一本学术专著。它以我最近几年在《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记者》和《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陆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作为基础。其中,刊于《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6期上的《制造职业荣誉的象征:中国官方新闻奖的制度实践(1980-2013)》一文是我的新闻奖系列论文中的一篇获奖论文: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组织的第三届(2014年度)全国新闻传播优秀论文的遴选

中,被评为优秀论文。然而,该文却并未以一种完整的面貌收入本书,相反,其内容被打散,消融于第一、三、四章。

准备这本小书的劳动量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好在我整个学期没有教学任务,才能够全力以赴地赶写书稿。一方面,为了让它具有了一本专著的模样,我从英文博士论文中择出三章,以中文加以改写,作为本书的前三章。另一方面,为了使该书不至于被读者批评为毫无新意,我竭尽所能地更新了大部分章节的实证数据,重做统计分析。这种更新主要体现在第三到七章。更新数据和重做分析的工作耗去了书稿准备的大部分时间。举例而言,为了索取长江韬奋奖前六届评委会的名单,我于2017年3月23日按照正式的程序,向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提出资料查询申请,却被告知这些资料尚未被电子化,只能到档案库进行人工查找,而彼时评奖办正忙于今年的评奖事务,分身乏术。后来,我委托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读博的一位老友去评奖办,代我处理这件事。5月9日,我终于取得了想要的信息。

虽然当今世界各国新闻业都拥有各自的新闻评奖制度与实践,本书却不是要纵论各国的新闻奖制度与实践,因为这远非我的学力所逮。本书只是对于中、美两国的新闻评奖制度及其实践进行了非常有限的观照。其中,前五章观照的是中国官方新闻奖制度与实践,而后三章则观照的是美国新闻奖的“百年老店”——普利策新闻奖。那么,本书为何是目前这样的结构呢?在中国的新闻奖与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普利策新闻奖之间展开适度比较,这是我做博士论文时的一种基本问题意识。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我愈发觉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插入使博士论文的结构显得很别扭,令其“故事线”不清晰,于是我就索性将有关普利策新闻奖的内容全部删除了。虽然对普利策新闻奖的研究未进入博士论文,但它却先后以几篇期刊论文的形式,进入了我的学术生命。可见,本书目前这种章节结构并非某种出于“科学逻辑”的安排,只不过是我对现有研究成果勉强赋予的一种秩序罢了。

本书的出版得到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新闻从业者的‘阐释共同体’——对于当前几种主要新闻话语的研究”(项目编号:13YJA860011)的资助,同时也得到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海外优秀博士资助计划”(项目编号:skyb201205tf)的资助。

趁本书出版之际,我要向诸多给予我帮助的人深致谢意:

首先要感谢的人是我的博士生导师、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讲座教授李金铨先生。感谢先生的厚爱,使我得以拥有双重身份:我先于2006年4、5月间参加他组织的“中国大陆青年传播学者到访项目”,成为“多友”,第二年被他录取为博士生。没有先生的栽培,便没有现在的我。他给我们上课的样子,他带我们行山的樣子,他和师母邀我们去家里喝茶聊天的样子,至今仍历历在目。今年2月26日下午,尚在与病魔斗争的先生通过微信,简短有力地勉励我要“一鼓作气”。

我要对当初在我做田野考察时接受我访谈的70多位被访者深表谢意。倘若没有他们提供的宝贵资料,我纵然巧妇也将陷于“无米之炊”的境地。由于研究伦理的约束,我无法在此一一罗列他们的姓名。

我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何舟教授和祝建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立峰教授,以及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潘忠党教授。何舟教授同时身居我的指导委员会和答辩委员会,给予我诸多建设性的意见。我不仅在博士期间修了祝建华教授的《传播学理论》课程,而且读博之前即已连续三年参加了他在深圳、武汉和北京开办的研究方法暑期班。李立峰教授在香港城大工作期间,我修过他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课程,他后来也是我的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2007年,在去香港城大读博前夕,我参加了潘忠党教授在云南大学组织的传播民族志暑期班。去年,我再次去云大,参加他组织的文化研究暑期班。

我要特别感谢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董天策教授。当年他还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工作时,我有幸成为了他的“开门弟子”。没有他的引领和教诲,我不可能走上学术的道路。

我要感谢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的熊壮博士,在我分身乏术的时候,毕业前夕的他二话不说,就答应帮我去中国记协评奖办公室索要资料,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我要感谢同门好友、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李红涛副教授。当年他进入四川大学读硕士时,我已留校任教;后来读博士时,他先我一年进入师门,遂荣升为“师兄”。我们的第一次合作始于读博期间,而最近几年我们围绕着“集体记忆”已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在生产论文的同时,也经意不经意地生产了很多快乐。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父母、姐姐、姐夫,以及侄子们,他们让我这些年即便漂泊在外,也随时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母亲当年没机会上学,这是她一辈子的遗憾,也由此形成了她对三个子女朴实的教育理念——“你读得多读点,读不得少读点”。现在,母亲看见我隔三岔五取回网购的书,有时会发出“又是书!”的抱怨,但其实她内心对于读书有一种深沉的渴望。父亲读书不多,在我求学的各个转折关头,他都宽厚地让我自行选择,为我慢慢成长为现在的自己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外部条件。高中和大学入学时,父亲都亲自送我去学校报到。父亲已离开我六年了,我把这本小书献给他。当年我在县城读高中时,需要从家里带米到学校食堂兑换饭票,花钱购买菜票,二姐经常专程或趁进货的机会为我送来米和钱,以致于我很多同学都认得她了。

最后,我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李唯梁博士。本书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最大原因在于,若干年前我跟他在四川大学有师生之谊。后来,重回川大工作的我到北京开会再见到他时, he 已从清华大学毕业,就职于这家出版社。他为本书的出版做了细致而出色的编辑工作。当然,本书的任何错讹之处,都由作者本人负责。

黄顺铭

2017年5月2日于自在居改定

本书献给：

黄心发先生，已永远离开我的父亲

目 录

第一章 官方新闻评奖制度的历史演进 / 1

- 一、新闻评奖制度的史前史 / 1
- 二、新闻评奖制度的两个时代 / 5
- 三、新制度主义视野下的新闻奖制度 / 19
- 四、一个政治-经济评奖模式 / 24
- 五、小结 / 27

第二章 历史偶像的声望命运及其当代询唤 / 29

- 一、“大偶像”在世声望之建立 / 30
- 二、“大偶像”后世声望之存续 / 33
- 三、“大偶像”在集体记忆中的后世形象 / 38
- 四、“小偶像”:地方化的社会再生产 / 46
- 五、偶像、认同与询唤 / 49
- 六、小结 / 59

第三章 官方新闻奖的把关人及其实践 / 61

- 一、把关人理论 / 61
- 二、把关人的结构特征 / 63
- 三、新闻评奖的把关实践 / 80
- 四、小结 / 105

第四章 官方职业荣誉的机会结构 / 108

- 一、引言 / 108
- 二、形塑荣誉机会结构的规则系统 / 108
- 三、荣誉机会结构:一个定量分析 / 116
- 四、小结 / 137

第五章 官方新闻精英的集体素描 / 140

- 一、引言 / 140
- 二、数据来源与分析 / 141
- 三、获奖者的基本特征 / 142
- 四、获奖者与参评者的比较 / 162
- 五、从参评者到获奖者 / 170
- 六、小结 / 172

第六章 普利策新闻奖的把关人及其实践 / 175

- 一、引言 / 175
- 二、把关人的结构特征 / 176
- 三、把关:评选实践 / 188
- 四、小结 / 199

第七章 普利策新闻奖颁奖辞的话语实践 / 202

- 一、引言 / 202
- 二、嘉奖辞的社会功能 / 203
- 三、颁奖辞的话语实践 / 207
- 四、小结 / 225

第八章 美国新闻精英的集体素描 / 228

- 一、引言 / 228
- 二、数据建构 / 229
- 三、研究发现 / 230
- 四、小结 / 246

参考文献 / 248

第一章 官方新闻评奖制度的历史演进

在《声望经济：奖项与文化价值的流通》一书中，詹姆斯·英格利希（James English）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尝试写一部现代文化奖项的历史呢？”他的回答是：“或许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奖项在各种文化场域之中惊人地无处不在，仍在持续不断地激增。”（English, 2005: 1）他的这番话也同样适用于中国的新闻场域：奖项、荣誉、称号等如此普遍地存在，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将它们视为理所当然，并熟视无睹，而事实上我们却对它们知之甚少。

本章将“讲述一个动态性的故事”（North, 2005: 7），即我国的官方新闻评奖制度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的演化史。我希望它不是一个描述性的故事，而是一段基于历史考察的简明的分析解释史。

一、新闻评奖制度的史前史

被人称为“评奖专业户”的中国记协国内部前主任阮观荣在《新闻奖的前奏曲：现场短新闻奖》一文开篇，就对我国的新闻奖历史作了这样的勾勒：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奖的设立和评选，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起步的。

开始是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以及部分省级新闻单位内部评选优秀新闻作品，接着是报纸、广播、电视进行本系统的新闻优秀作品评选。到 1980 年，中国新闻学会开始举办“全国好新闻奖”，评选包括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在内的新闻作品奖……（阮观荣，2008a: 49）

他的这段叙述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在以“全国好新闻奖”为标志的新闻奖

制度正式确立之前,我国新闻界中存在着新闻单位内部的新闻评奖。不过,这个历史叙述以“20世纪70年代后期”为起点是不太恰当的,导致他一方面大大缩短了新闻单位内部新闻评奖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没有注意到在此之前超越单个新闻单位之上的公开的新闻评奖活动。

提到内部新闻评奖,就不得不提新华社的稿件评析(简称“评稿”)制度。刘敬国(1984:388)指出:“评稿,是新华社业务建设上的优良传统之一,始于革命战争年代。”《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简史》中也简笔提及:

稿件评析在新华社也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新华社总社经常发出通报,表扬一些优秀新闻作品,供采编人员学习;同时,通报一些有缺点、错误的稿件,引以为戒。为了保证稿件不出差错,新华社在延安时期就制定了两人互相校对的制度,后来还制定了每周评稿总结制度、核稿制度和检查制度等。新中国成立后新华社成立了消灭稿件错误委员会,开展消灭稿件错误活动。1951年2月13日,总社借鉴解放军练兵运动的经验,制定发布了《关于练笔运动的决定》。这次练笔运动一直坚持了两年多。在此期间,新华社还编辑出版了《每日新闻检查》,刊登的内容有对报道的意见、有练笔运动的成绩、有对具体稿件的分析评论。“文革”结束以后,新华社重新确立了评稿制度,在新闻研究部成立以前曾由国内部负责每周评稿工作。(新华社新闻研究所,2009:6)

在1958年3月,新华社国内新闻编辑部还别开生面地举办过一次“稿件评比展览会”,由“反浪费”“反对保守”和“挖掘潜力”三部分组成。其中,在第一部分,“展出了许多写得冗长、粗糙的稿件,有一篇六千三百多字的长新闻,被删改后只采用了二千一百字”。在第三部分,“一条红色的大标语上写着:‘提高质量,消灭次品,减少废品,反对冗长,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在这一部分里,展出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同一题材的报道对比。《人民日报》的稿件在许多方面比新华社稿件写得好,在‘向《人民日报》学习’的标题下,剪贴了一些《人民日报》抓气候、抓思想、抓问题、抓典型写得好的稿件。”(佚名,1958a:54)

“文化大革命”期间,评稿制度中断,直到1978年才恢复。恢复以后,既有各编辑部和分社的定期评稿,也有每周一次的全社性评稿,评稿情况在内刊《评

稿纪要》上刊登,还有年度性的全社好稿评选。其中,社级年度好稿评选是1980年恢复的,为此还成立了“好稿评选委员会”。

除了这种在新闻单位内部以不同时间节奏开展的“稿件评析”或“好稿评选”之外,也零星地出现过超越单个新闻单位之上的公开的新闻评比/评奖活动,作为新闻界在“大跃进”运动中的一种表现而存在。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新闻单位不仅在内部展开革命/友谊竞赛,而且彼此之间也通过“评比”或“挑战/应战”等方式来展开这种革命/友谊竞赛。1958年第3期《新闻战线》就发表了《山西日报》编委会给全国省级报纸下的挑战书,很快就引来《河北日报》《湖北日报》《辽宁日报》《吉林日报》和《大众日报》等报纸的应战。接着,《新闻战线》第4期发起了一个竞赛倡议书——《省市报纸来一次标题评比》,全文如下:

评比是推动工作的有效方法。在当前全国报纸大跃进中,本刊编辑室提出这样一个倡议:通过《新闻战线》杂志,让全国省市级报纸来进行一次标题的评比工作。我们欢迎全国省市报纸都来参加这次评比,支持这个评比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次评比,使省市报纸的同志来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标题的质量。

凡是参加这次评比的省市报纸,请你们给本刊推荐四月一日至十五日这十五天中,你报各版上最好的两则标题(新闻的内容和来源不论,国际或国内新闻都可以)。各报所推荐的标题应该为报社编辑部多数同志所公认。因此,在推荐之前,最好在各报编辑部内部先进行一次群众性的评比,通过评比来确定该推荐的标题。推荐的标题寄来本刊的时候,要附上新闻内容(最好把标题和新闻的剪报寄来),同时说明推荐的理由。

参加评比的标题,请在四月底前寄到本刊编辑室,我们将在五月份本刊上如数刊登,然后请各报来进行评比,从所有这些标题中挑选出前五名,附理由,告诉本刊。最后由本刊综合各报评比的意见,确定最优秀的五个标题。

这次评比带有试验性质,因此范围只局限于省市报纸;我们欢迎大家对这样的评比工作提出意见。在见到这个倡议后,就请各省市报社立即行动起来吧!(本刊编辑室,1958a:5)

随后,该刊第5、6两期刊登了由26家报社推荐出的52个“好标题”参评作品,并热情地发出呼吁:

现在就请所有的省市报社,不论已参加评比的,或因故没有参加评比的,都热烈地就这五十三个标题来展开评选吧!从这五十三个标题中挑选出前五名来(参加评比的报社完全可以选自己报纸的标题)。我们希望各省市报纸编辑部全体同志都能通过各种方式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各报集中多数同志的意见选出前五名,排定名次,附理由,告诉本刊,由本刊根据各方面的意见,作最后的评定……

我们也欢迎省市报纸以外的其他报纸的同志们,广播电台的同志们,以及本刊广大的读者都来参加这次评选,请你们把你们的集体意见或个人意见,告诉我们,供我们在进行最后评定时参考。(本刊编辑室,1958b:34)。

这次标题评比结果在第8期揭晓,《山西日报》《福建日报》《甘肃日报》《辽宁日报》和《山西日报》的标题分别夺得前五名。《新闻战线》编辑部也公布了自己的评选方法:

我们的评定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整理了各省市报纸送来的评比意见,然后根据每个标题得票的票数来确定前五名。在评定过程中,我们也考虑了各地读者的意见。(本刊编辑室,1958c:52)

这次标题评选存在着诸多局限:首先,评选项目仅仅局限于“报纸标题”一项;其次,评选时间范围仅仅局限于半个月;第三,评选的媒体范围仅仅局限于省市级报纸;第四,这次评比/选活动并未成立专门的评选委员会;第五,这次评比/选活动只是“大跃进”运动中一次性的评奖行为,并未由此而创立新闻评奖制度。尽管如此,这次评奖仍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很有可能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新闻界最早的一次全国性的新闻评奖活动;另一方面,由《新闻战线》杂志社所倡议并主持的这次“标题评比”活动无疑为它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再次发起并主办首届“全国好新闻评选”起到了积累经验的作用。

与此同时,“大跃进”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新闻评奖。譬如,1958年7月,在四川成都召开的西北、西南地区七省人民广播电台的协作会议决定,举办一次“优秀广播稿件”和“优秀录音报道”的评比。由贵州人民广播电台主

持的这次评比活动于1959年10月揭晓,其中优秀广播稿件和优秀录音报道分别评出甲、乙、丙等奖各一件(佚名,1958b:17)。这次新闻评奖同样也是一次性的。

二、新闻评奖制度的两个时代

我国官方新闻评奖制度三十多年的历史可以被清楚地划分为两个时代:一是20世纪整个80年代,二是从90年代初以来的这段时期。在第一个时代,官方新闻评奖主要掌握在各级新闻学会的手里;而到了第二个时代,新闻评奖的 leadership 发生了转移,转移到了各级新闻工作者协会(简称“记协”)的手里。尽管如此,这两个时代却都是遵循着同一种“国家管理模式”,那就是,由各级宣传部门委托官办的专业组织——在第一个时代是新闻学会(以及记协),在第二时代则是记协——来具体地组织和实施官方新闻奖的荣誉生产。

1. 新闻学会时代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从60年代中期开始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而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此走上了一个“改革开放”的崭新时代。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治下逐步确立起来的文化秩序遭受到了异常严重的破坏,很多机构和制度都处于几近甚至完全瘫痪的状态。而在精神上,文化工作者们也被一种反智主义的象征暴力——“反对成名成家”——所束缚着,无法正常地去追求专业或职业上的卓越成就。

邓小平同志成为党和国家新的领导核心后,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一系列范围广泛、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得以出台和启动。譬如,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制度。同年,在胡耀邦同志的领导下,启动了“平反冤假错案”。这两项重要举措使知识分子得以重新回到正常的社会角色和地位。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热烈讨论。该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主题报告(邓小平,2002:140—153)。这次会议于12月18日在京

举行,通常被简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历史性决策。从此,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人制度的改革》,为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总之,在这一个转型时期,整个国家处于一种蓬勃昂扬的状态。可以肯定地说,正是中国社会在总体上的社会转型从根本上为作为一种制度创新的文化奖项(包括新闻奖在内)的出现准备了丰富而成熟的条件。

我们只有把文化奖项的出现放回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特定历史语境之中,其重要的社会—文化意义才能够得到充分的认识和理解。1964年5月,中宣部草拟了一份报告,对于当时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其他一些全国性协会的整风情况做了评价。报告批评说,中国文化艺术界联合会中的某些人存在着一种错误思想,即他们一心想通过“写作”来达到“成名成家”的目标。报告被呈送给毛泽东,他看后作出了如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泽东,1996:91)毛泽东的这个批语彰显了当时政治斗争强烈的火药味。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对成名成家”一直是一个敏感而严重的指责。假如一个人被指责为想“成名成家”,那将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事后来检讨这一指责时,自然非常清楚“反对成名成家”是一种很典型的反智主义思想。然而在当时,激进的政治运动把“成名成家”建构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冲突话语的一部分,“成名成家”意味着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是必须加以清除的。在大致了解这一历史背景之后,我们也就可以认为,文化奖项的出现是对于“成名成家”思想的一种抛弃,因为这些奖项本质上就是在给予职/专业上的优异表现一种应有的社会承认,将获奖者树立为职业榜样或者说角色模范,赋予他们声望或名望。

文学奖在新时期的整个文化场域之中扮演了开路先锋的角色。1978年1月,成立恢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筹备领导小组,同年5月中国作协正式恢复工作,《人民文学》《诗刊》和《文艺报》也相继复刊。同年10月,中国作协利用《人民文学》杂志作为平台,发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选活动,评选委员会由茅盾、巴金、周扬、刘白羽等23名著名作家和评论家组成。当时,文学界

的领袖们急切地想要结束已经与新时代格格不入的“文革文学”，呼吁作家们去书写“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火热斗争”（人民文学，1978：封三）。最终，评选出 25 篇获奖作品。身为评委会主任的作协主席茅盾（1979：4）在颁奖典礼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这次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的确是空前的、过去没有做过的。”评委会委员袁鹰（1979：11）也寄予高度评价：“《人民文学》这次在全国范围内，依靠广大读者，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评选，是建国三十年来的一个创举。”后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周扬（1981：5）在 1980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会上则指出：“评奖就是对我们的作家们的出色的创造性劳动的一种鼓励。评奖是促进文艺繁荣和科学进步的一种有效的良好方法。我们要把评奖这种活动经常化、制度化。”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作协随后还新办了一份文学杂志《小说选刊》，旨在为一年一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提供一种制度性的保障。二十年后，文学批评家孟繁华（2001：261）在论及 1978 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的重要意义时，称“它首次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文学奖项”。其他文学奖也通过效仿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迅速地建立了起来。文学奖的评选赢得了阅读公众的热情欢迎和支持，换句话说，作为制度创新的文学奖得到了来自社会的“正反馈”（North，1990）。

文学奖的成功既为新闻奖提供了正当性的直接来源，也提供了一套切实可行的评奖操作模式。文学奖是首先从“短篇小说”上寻求突破，新闻奖也是从一个评选项目上寻求突破的，这个项目就是“消息”，也就是狭义的“新闻”。

1979 年 10 月，《人民日报》旗下的《新闻战线》杂志在第 10 期的封三发表了一则评选年度好新闻的倡议，全文如下：

大家都来评选今年的好新闻

新闻工作要改进，新闻报道要加强。这是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日子里，在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新形势下，广大新闻工作者和读者、听众的共同愿望和急切要求。两年多来，全国各个新闻单位，都在积极努力采取措施改进自己的工作，特别注意加强新闻报道，有的已经初见成效。但是，总的说来，距离党和人民的要求和期望尚相差甚远，还须做出更大的努力。目前新闻报道的量少、质差、迟缓、老套，落后于四化建设的发展，有关方面和读者都不满意，亟待来一个突破。本